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
三
十
二
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陈拯,郑宇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32辑)

ISBN 978-7-208-18443-5

I. ①国… II. ①陈… ②郑… III. ①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①D80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41732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夏芳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32辑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新

陈拯 郑宇 主编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9

插页 2

字数 438,000

版次 202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2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8443-5/D·4172

定价 118.00元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北大复旦人大清华 国关青年教师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祁怀高**

【内容提要】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重镇。本文选取四校国际关系学科的青年教师,进行“双一流”建设前后的纵向对比分析和四校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相比2010年,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学历更高、受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代表性科研成果数更多、更加注重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高级职称占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期刊论文发表等方面各具优势。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未来成长,需要处理好国际培养和国内培养、学科建设和支撑平台、学科边界和学科融合、代际差异和代际传承、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校际竞争和校际合作这六对关系。

【关键词】 “双一流”,国际关系,北大复旦人大清华,国关青年教师

【Abstract】 Peking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are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oung facul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ove four universities before and after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nd the horizontal comparative analysis among the four universitie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2010, young faculties in 2020 have more advanced degrees, great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more research outputs with representativeness and more emphasis on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conventions. Each university does have its own advanta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senior professional titles, the number of projects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nd good journal publications. A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manage six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ultiva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supporting platform,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integ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nd inheritance, academic and policy research,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Young Facul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感谢以下学者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心伯教授、冯玉军研究员、谢超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季平研究员、郑宇教授、张骥教授、陈拯青年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孙学峰教授、刘丰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教授。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陆吉、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张泽宇帮助整理相关数据。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 祁怀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一、介 绍

“双一流”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简称。“双一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 工程”“985 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旨在实现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①2017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简称《第一轮“双一流”名单通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正式确认公布。^②2022 年 2 月 1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简称《第二轮“双一流”名单通知》),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③

《第一轮“双一流”名单通知》中,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的政治学建设高校六所。具体包括(按学校代码排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其中,外交学院的政治学学科加“自定”标示,意思是根据“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建议由高校自主确定的学科;除外交学院外的其他五所高校,政治学学科不加“自定”标示,意思是根据“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确定的标准而认定的学科。^④

《第二轮“双一流”名单通知》中,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的政治学

①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 号,2015 年 10 月 24 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1/05/content_10269.htm。

②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17〕2 号,2017 年 9 月 21 日。

③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22〕1 号,2022 年 2 月 11 日。

④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

建设高校四所,另有两所高校自主确定建设学科并自行公布。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的政治学建设四所高校为(按学校代码排序):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并自行公布的两所高校为(按学校代码排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2017年12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简称“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①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参政政治学学科的高校76所。其中,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按学校代码排序)的政治学学科被评为“A+”,中国人民大学被评为“A”,清华大学被评为“A-”。

从学科整体排名来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复旦大学(简称“复旦”)、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清华大学(简称“清华”)四校的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科排名稳居中国大陆高校前列。2019年以来四校的政治学学科排名(QS世界学科排名)均在前100名之列。在2013年至20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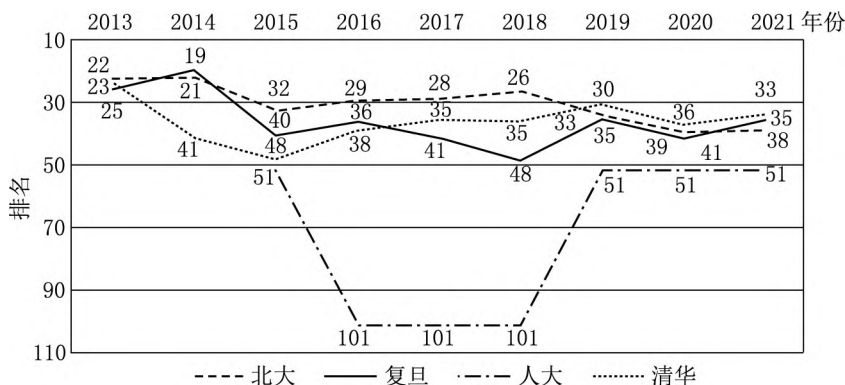


图1 四校QS世界学科(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排名(2013—2021年)

数据来源:QS 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Peking University,”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peking-university>; “Fudan University,”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fudan-university>; “Renmin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renmin-peoples-university-china>; “Tsinghua University,”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tsinghua-university>.

^①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高校评估结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7年12月,<https://www.cdgc.edu.cn/dslxkpgjgb/>。

的 QS 世界学科排名中,北大、复旦、清华的政治学学科排名始终位居中国大陆高校排名前三;2015 年至 2021 年的 QS 世界学科排名中,人大的政治学学科排名始终位居中国大陆高校排名第四。^①2013 年至 2021 年间,北大的政治学学科 QS 排名,在第 21 和第 39 之间,排名均位数为 30;复旦的政治学学科 QS 排名在第 19 和第 48 之间,排名均位数为第 36;清华的政治学学科 QS 排名在第 23 和第 48 之间,排名均位数为第 35。2015 年至 2021 年间,人大的政治学学科 QS 排名在第 51 和第 150 之间,排名均位数为第 72。四校在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科的卓越排名,为吸引优秀的青年教师入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国际关系(简称“国关”)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②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三个二级学科,都统称为国际关系;并将四校中从事上述三个二级学科和区域国别教学科研的青年教师统称为国关青年教师。在本文的统计数据中,国关青年教师不包括主要聚焦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教学科研的青年教师。没有正式入编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没有统计在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内。

鉴于四校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科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因此本文选取这四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在学科发展中,青年教师在“双一流”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建设任务中提到,“以中青年教师和创新团队为重点,优化中青年教师成长发展、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③因此,我把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作为分析样本。本文青年教师群体的范围是,截至 2020 年 12 月,年龄在 45 周岁及以下,出生日期在 197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

①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21: Politics 2021,” <https://www.qschina.cn/en/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1/politics>, 2022-02-27.

②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学科、专业目录》,访问时间:2022 年 2 月 27 日。

③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二、文献综述

我未发现专门研究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过,一些研究“双一流”建设学科、学科评估、高校青年教师成长等的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相关文献有:赵星、蔡前黎、乔利利研究了中国当前“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分布格局与合作态势,76%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间科研合作强度低于全国平均值,主要“双一流”建设学科之间的合作并不活跃。^①赵星等的论文启示:四校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双一流”学科建设应当规避过度竞争,强调合作与差异化特色。刘小强、蒋喜锋研究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模式”和“中心模式”,认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用的是“学科模式”,而发达国家地区大多采取的是“中心模式”,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既要坚持“学科模式”,又要借鉴“中心模式”,跨越学科、高校、行业组建研究中心。^②刘小强等的论文为我思考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校际合作提供了启示。沈健、胡娟对中美两国29所世界一流高校的学科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美国高校相对更为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中国高水平大学的理科基础学科覆盖率比美国一流高校低12%,文科基础学科覆盖率低30%。^③沈健等的论文启示我应思考四校政治学学科建设可借鉴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的优秀经验。

研究中国高校学科评估的相关文献有: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迄今已公布四轮评估结果。2012年第三轮评估结果中,政治学学

^① 赵星、蔡前黎、乔利利:《合作与竞争: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分布格局》,《图书与情报》2018年第4期,第1—9页。

^② 刘小强、蒋喜锋:《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科模式”和“中心模式”——“双一流”首轮建设期满之际的反思》,《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0期,第27—33页。

^③ 沈健、胡娟:《高水平大学优势学科布局与选择的量化分析——基于中美两国29所世界一流高校的数据》,《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9期,第61—67页。

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得分都是“89”,并列第一。^①2017 年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政治学学科,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被评为“A+”,中国人民大学被评为“A”,清华大学被评为“A-”。^②英国 QS 公司发布的世界学科排名,四校的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科自 2019 年以来全球排名均在前 100 名之列。^③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和英国 QS 公司的世界学科排名,是笔者选取北大复旦人大清华四校的重要依据。黄宝印撰文分析需着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学科评估新体系,提到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奖项”,设置“代表性著作”等指标,进行多维度科研成效评价,规定代表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突出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④黄宝印的论文启示,评估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核心科研能力,需要以代表作为主,且需包含一定比例的国际关系类中国期刊论文。

研究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成长的相关文献:徐昭恒、王琪、朱军文撰文分析了高校青年教师缘何参与大学国际化,他们认为,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的主要动机在于加强科研产出、获取学术资源、建立一种广义的学术声誉,其核心诉求是积累推动学术工作发展的各类学术资本。^⑤李健、薛二勇认为,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驱动下,“海归”青年教师的学术竞争力和学术表现力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得以良好展现;将国际学术界的匿名评审机制和长聘机制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助于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学术标准。^⑥上述 2 篇文献为笔者思考四校

①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 年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hinadegrees.cn/xwyyjsjyxx/xsbdxz/index.shtml>。

②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高校评估结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7 年 12 月,<http://www.cdgc.edu.cn/xwyyjsjyxx/xkpgj/>。

③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21: Politics 2021,” <https://www.qschina.cn/en/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subject-rankings/2021/politics>。

④ 黄宝印:《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学科评估新体系》,《中国高等教育》2021 年第 17 期,第 4—6 页。

⑤ 徐昭恒、王琪、朱军文:《激情背后的“理性”:高校青年教师缘何参与大学国际化》,《复旦教育论坛》2018 年第 5 期,第 83—90 页。

⑥ Jian Li & Eryong Xue, “Returnee Faculty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izing ‘academic ecology’ for Creat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Elite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 Vol.81, No.5(2021), pp.1063—1078.

青年教师如何培养国际视野提供了启示。

三、“双一流”建设前后四校国关 青年教师的纵向对比分析

“双一流”建设启动于2015年,其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为了分析“双一流”建设启动前后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变化,笔者分别选取2010年^①和2020年^②这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

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相关数据包括以下方面:(1)性别。分析男性和女性的人数比率,并重点分析女性国关青年教师的占比。(2)职称。职称分为中级、副高级、正高级三类。中级职称包括讲师、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员、青年副研究员;副高级职称包括副教授、副研究员、青年研究员;正高级职称包括教授、研究员。在职称信息中,本文将重点关注正高级国关青年教师的人数及占比。(3)博士学位,本文将重点关注国关青年教师入职前获国内、国外博士学位的比例。(4)博士后研究经历。(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一代表性科研项目立项数来评估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6)《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以《世界经济与政治》这一中文代表性学术期刊为例分析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中文代表性论文发表情况。(7)SSCI期刊论文发表数,评估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英文代表性论文发表情况。

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群体将细分75后、80后、85后、90后四个不同年龄梯队。就2020年的统计数据而言,75后统计1975年1月1日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80后统计1980年1月1日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85后统计1985年1月1日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90后统计1990年1月1日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就2010年的统计数据而言,“45周岁及以下”统计1965年1月1日及其以后出生的教师;“40周岁及以下”统计

① “2010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12月31日。

② “2020年”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

1970 年 1 月 1 日及其以后出生的教师；“35 周岁及以下”统计 1975 年 1 月 1 日及其以后出生的教师；“30 周岁及以下”统计 1980 年 1 月 1 日及其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

表 1 2010 年和 2020 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人数变化

年龄段 机构	1965 年以后出生且 2010 年时在职				1975 年以后出生且 2020 年时在职			
	45 周岁 及以下 (1965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40 周岁 及以下 (1970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35 周岁 及以下 (1975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30 周岁 及以下 (1980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75 后 (1975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80 后 (1980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85 后 (1985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90 后 (1990 年 及以后 出生) 人数 (女性)
北大	26(4)	10(3)	6(2)	1(1)	19(7)	11(6)	6(4)	1(1)
复旦	36(10)	24(9)	15(5)	3(1)	34(8)	17(5)	12(4)	2(0)
人大	23(12)	12(5)	5(2)	0(0)	22(7)	15(5)	7(3)	2(2)
清华	7(2)	4(1)	3(1)	0(0)	19(4)	14(2)	11(2)	2(0)
合计	92(28)	50(18)	29(10)	4(2)	94(26)	57(18)	37(13)	7(3)
女性占比	30%	36%	34%	50%	28%	32%	35%	43%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https://www.sis.pku.edu.cn/>；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网站 <https://sirpa.fudan.edu.cn/>；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https://iis.fudan.edu.cn/>；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网站 <https://brgg.fudan.edu.cn/>；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http://sis.ruc.edu.cn/>；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网站 <https://www.dir.tsinghua.edu.cn/>；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从 2010 年和 2020 年的人数对比来看，10 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人数稍有增长。从 2010 年的 92 人小幅增长到 2020 年的 94 人（见表 1）。但四校的人数变化不一样，其中，北大从 2010 年的 26 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19 人，复旦从 2010 年的 36 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34 人，人大从 2010 年 23 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22 人，清华从 2010 年的 7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19 人（见图 2）。人数变化幅度最大的是清华，2020 年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171%。清华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增长最快，主要原因是 2017 年 9 月清华成立的国

际与地区研究院,为清华大学实体科研机构^①,自成立以来留任了大批清华大学“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的青年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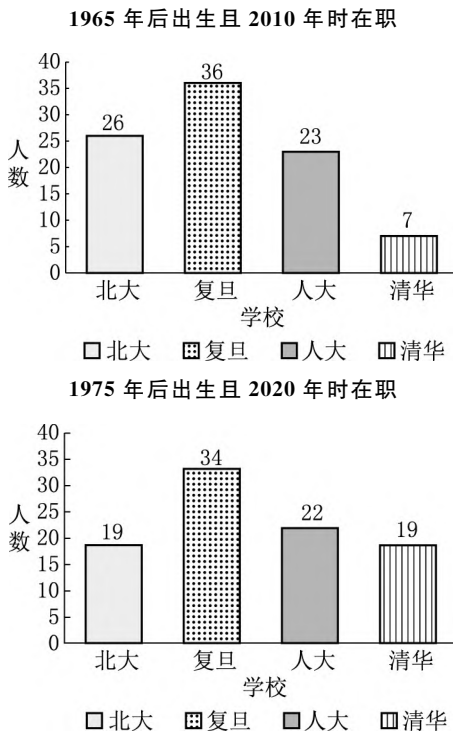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和2020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人数变化

数据来源:同表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从2010年和2020年的性别数据来看,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女性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而呈总体增加趋势(见表1)。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数据显示,45周岁及以下的女性青年教师人数占30%、40周岁及以下占36%,35周岁及以下占34%,30周岁及以下占50%。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数据显示,75后女性青年教师人数占28%,80后占32%,85后占35%,90后占43%。以北大为例,75后女性青年教

^①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研究院概况》, <http://iias.tsinghua.edu.cn/about/general-information/>,访问时间:2022-03-14。

师人数占 37% (7/19), 80 后占 55% (6/11), 85 后占 67% (4/6), 90 后占 100% (1/1)。

从三类职称的人数来看,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 2010 年和 2020 年呈现不同的变化(见图 3 和表 2)。其中,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中级职称人数从 2010 年时的 28 人(占 30%)增加到 2020 年时的 40 名(占 43%, 40/94),增加 13 个百分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副高级职称人数从 2010 年时的 45 人(占 49%)减少到 2020 年时的 30 名(占 32%),减少 17 个百分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正高级职称人数从 2010 年时的 18 人(占 20%)增加到 2020 年时的 24 名(占 26%),增加 6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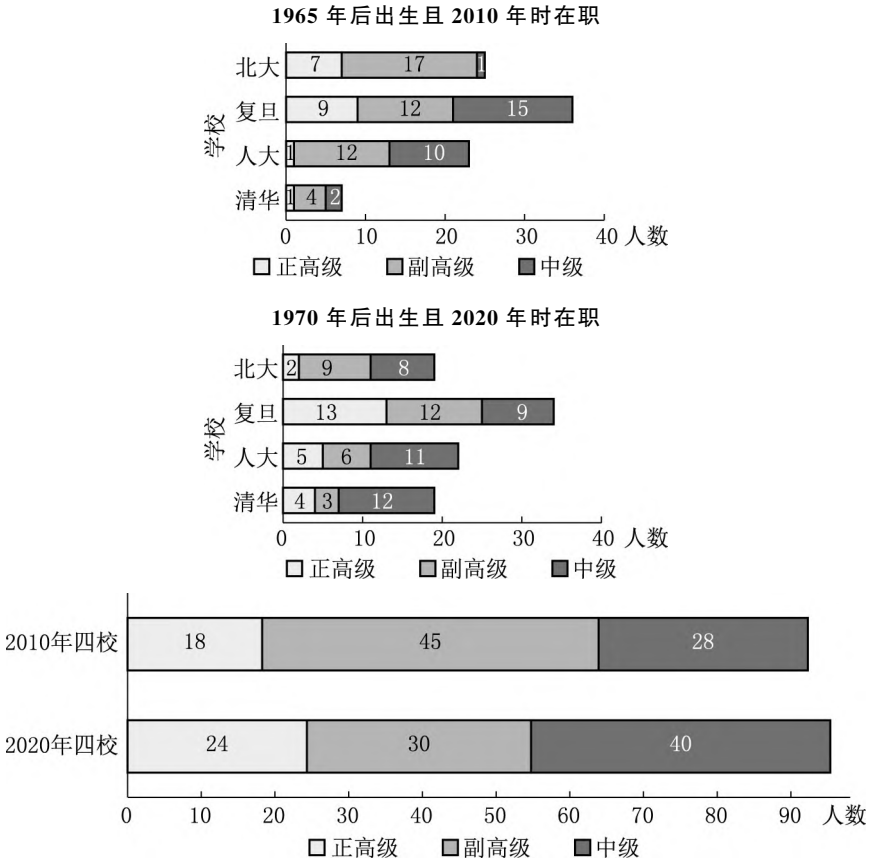


图 3 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 2010 年和 2020 年时的职称变化

数据来源:同表 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从2010年和2020年博士学位数据来看,10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从国外学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比率大幅上升(见图4和表3)。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92名青年教师中,89名获得博士学位,但有3人最高学位为硕士;20人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在92名青年教师中占22%。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94名青年教师,全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40名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在94名青年教师中占43%。2020年时在职的国关青年教师相对于2010年时在职的国关青年教师而言,从国外学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比率上升21个百分点。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2020年时在职的国关青年教师相对于2010年时在职的国关青年教师而言,获国内国外双博士学位的人数增长125%。^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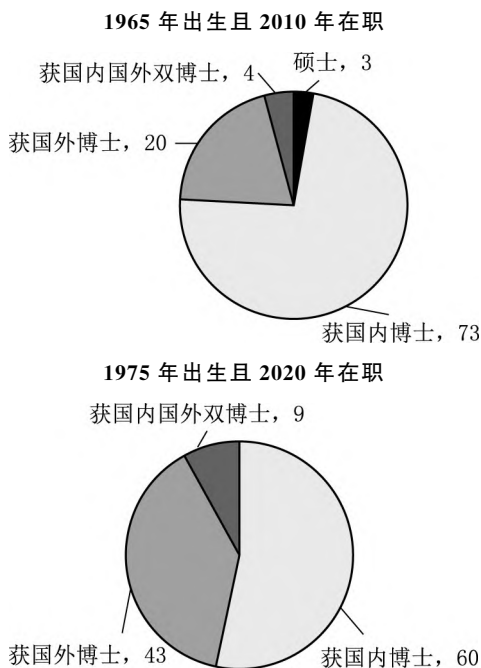


图4 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2010年和2020年时的博士学位变化

注:获港澳台地区博士学位统计为获国内博士学位。
数据来源:同表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① 2010年时在职的国关青年教师获国内国外双博士学位人数为4人;2020年时在职的国关青年教师获国内国外双博士学位人数为9人。

从 2010 年和 2020 年博士后研究经历数据来看,10 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国内/国外学术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数有较大增加。201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92 名)中,12 名有博士后研究经历。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94 名)中,19 名有博士后研究经历。2020 年相对于 2010 年而言,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青年教师增加 58 个百分点。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①来看,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立项数是 2010 年时在职的近 2 倍。通过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②进行项目查询,201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累计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3 项。其中,北大 10 项、复旦 9 项、人大 3 项、清华 1 项。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累计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45 项,其中,北大 5 项、复旦 25 项、人大 10 项、清华 5 项。10 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增长 96%,人均立项数从 2010 年的 0.25 项增加到 2020 年的 0.48 项。这显示“双一流”建设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科研项目立项能力有积极促进作用。

从《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③来看,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发表数是 2010 年时在职的 2 倍多。201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75 篇,其中,北大 33 篇、复旦 50 篇、人大 19 篇、清华 19 篇。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累计发表学术论文 165 篇,其中,北大 12 篇、复旦 60 篇、人大 53 篇、清华 40 篇。10 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增长 120%,人均发表数从 2010 年的 0.82 篇增加到 2020 年的 1.76 篇。这显示“双一流”建设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中文权威期刊发表能力有积极促进作用。

① 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

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

③ 本文仅统计相关青年教师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短文、研讨会发言摘要、商榷类短文、会议综述、学者访谈类文章不纳入本文统计范围。

2020年和2010年相比,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①相比国内其他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数,增加了15个百分点。201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共刊发学术论文106篇,国内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学术论文60篇,其中,四校青年教师发表7篇。2010年,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占国内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数的12%。202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共刊发学术论文72篇,国内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学术论文41篇,其中,四校青年教师发表11篇。2020年,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占国内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数的27%。2020年的数据和2010年的数据相比,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比率上升15个百分点。一方面,似乎说明四校青年教师相对于国内其他学术机构的青年教师而言,在国内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的能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可能表明“双一流”建设使得四校的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科资源更丰富,使得四校青年教师的整体学术科研能力更强。

从SSCI期刊论文发表数^②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发表数是2010年时在职的3倍多。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4篇,发表者14人。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6篇,发表者35人。10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SSCI期刊论文人均发表数从2010年的0.26篇增加到2020年的0.81篇。这显示“双一流”建设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英文高水平期刊发表能力有积极促进作用。

综上,“双一流”建设启动后,四校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和国际化程度都有了较大提升。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和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相比较,2020年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是2010年时的近2倍,2020年时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是

^① 本文仅统计相关青年教师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短文、研讨会发言摘要、商榷类短文、会议综述、学者访谈类文章不纳入本文统计范围。

^② SSCI期刊的目录,来自:<https://mjl.clarivate.com/collection-list-downloads>。本文仅统计相关青年教师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SSCI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2010 年时的 2 倍多,2020 年时的 SSCI 期刊论文发表数是 2010 年时的 3 倍多,2020 年时从国外学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比率比 2010 年时上升 21 个百分点。

四、2020 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 整体分析及横向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了 1975 年以后出生且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 94 人。其中,北大 19 人,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 34 人,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人大 22 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 19 人,来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接下来将对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数据进行整体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

从性别来看,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女性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总体呈递增趋势(见表 1)。北大 75 后女性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占 37%(7/19),80 后占 55%(6/11),85 后占 67%(4/6)。复旦 75 后女性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占 24%(8/34),80 后占 29%(5/17),85 后占 33%(4/12)。人大 75 后女性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占 32%(7/22),80 后占 33%(5/15),85 后占 43%(3/7)。清华 75 后女性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占 21%(4/19),80 后占 14%(2/14),85 后占 17%(2/12)。如果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女性占比做横向对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北大、人大、复旦、清华。女性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总体呈递增趋势,表明更多优秀的女性教师入职四校,也表明性别更趋平等。

从三类职称的人数来看,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各有优势(见表 2 和图 5)。从高级职称(含正高级和副高级)占比来看,从高到低分别是复旦(74%)、北大(58%)、人大(50%)、清华(37%)。清华的高级职称占比较低,主要原因是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8 名助理研究员)、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 名助理研究员)这两个机构的青年教师全部为助

理研究员(中级职称),从而拉低了清华国关教师的高级职称整体占比。从正高级占比来看,最高的是复旦(13人,占38%),这显示复旦国关青年教师在四校中的高级职称优势。复旦的13名正高级职称国关青年教师,绝大部分集中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9名正高级职称)。如果职称晋升机制设计合理,从长远来看,目前中级职称占比较高的清华(63%)和人大(50%)未来将有很大的人才发展潜力。前面的分析提到女性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占比28%(见表1),但女性高级职称(含正高级和副高级)占比却只有11%(见表2),这显示女性如果要晋升到四校的高级职称头衔,取得高质量的两性平等,仍然任重道远。

表2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职称信息

机构 \ 职称	高级(正高级 + 副高级)		正高级		副高级		中 级	
	人数 (占比)	女性 (占比)	人数 (占比)	女性 (占比)	人数 (占比)	女性 (占比)	人数 (占比)	女性 (占比)
北大 (19人)	11(58%)	2(11%)	2(11%)	0(0%)	9(47%)	2(11%)	8(42%)	5(26%)
复旦 (34人)	25(74%)	4(12%)	13(38%)	3(9%)	12(35%)	1(3%)	9(26%)	4(12%)
人大 (22人)	11(50%)	2(9%)	5(23%)	0(0%)	6(27%)	2(9%)	11(50%)	5(23%)
清华 (19人)	7(37%)	2(11%)	4(21%)	1(5%)	3(16%)	1(6%)	12(63%)	2(11%)
四校合计 (94人)	54(57%)	10(11%)	24(26%)	4(4%)	30(32%)	6(6%)	40(43%)	16(17%)

数据来源:同表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从博士学位来源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各有特色(见表3和图6)。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例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而呈总体增加趋势。比如,四校75后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率为46%,四校80后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率为49%,四校85后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率为57%。四校国关青年教师(75后)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率,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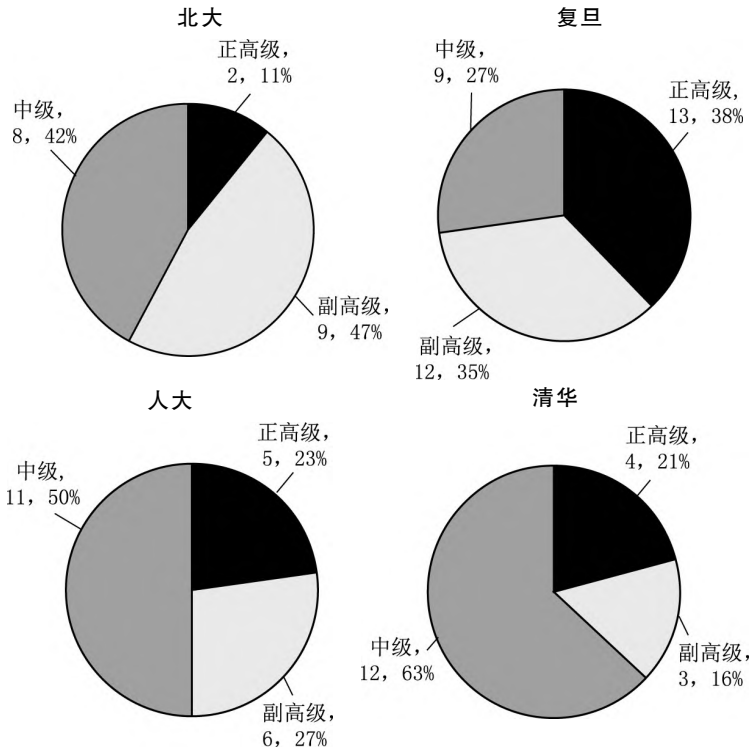


图 5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职称信息

数据来源:同表 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高到低,分别是:北大(74%)、人大(50%)、复旦(35%)、清华(32%)。四校国关青年教师(“75 后”)获国内博士学位^①的比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清华(68%)、复旦(65%)、人大(64%)、北大(53%)。本校博士学位获得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清华(53%)、北大(42%)、复旦(35%)、人大(18%)。这表明,清华北大复旦三校国关青年教师有相当大比率是从各自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北大、复旦、人大的国关青年教师都有获国内国外双博士学位者。其中,5 位青年教师获得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双博士学位,占获国内国外双博士学位青年教师人数(9 人)的 56%。

^① 获港澳台地区博士学位统计为获国内博士学位。

表 3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信息

机构;博士学位		年龄段	75 后(1975 年及以后出生) 人数(占比)	80 后(1980 年及以后出生) 人数(占比)	85 后(1985 年及以后出生) 人数(占比)
北大 (19 人)	获国内博士	10(53%; 10/19)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8 人(42%)	6(55%; 6/11)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4 人(36%)	1(17%; 1/6)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0 人(0%)	
	获国外博士	14(74%; 14/19)	8(73%; 8/11)	6(100%; 6/6)	
	获国内国外双博士	5(26%; 5/19)	3(27%; 3/11)	1(17%; 1/6)	
复旦 (34 人)	获国内博士学位	23(65%; 22/34)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12 人(35%)	9(47%; 8/17)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3 人(18%)	5(42%; 5/12)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1 人(8%)	
	获国外博士	12(35%; 12/34)	9(59%; 10/17)	7(58%; 7/12)	
	获国内国外双博士	1(3%; 1/34)	1(6%; 1/17)	0(0%; 0/12)	
人大 (22 人)	获国内博士	14(64%; 14/22)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4 人(18%)	8(53%; 8/15)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1 人(7%)	2(29%; 2/7)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0 人(0%)	
	获国外博士	11(50%; 11/22)	8(53%; 8/15)	5(71%; 5/7)	
	获国内国外双博士	3(14%; 3/22)	1(7%; 1/15)	0(0%; 0/7)	
清华 (19 人)	获国内博士	13(68%; 13/19)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10 人(53%)	11(79%; 11/14)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9 人(64%)	9(75%; 9/12) 其中,获本校博士学位 8 人(67%)	
	获国外博士	6(32%; 6/19)	3(21%; 3/14)	3(25%; 3/12)	
	获国内国外双博士	0(0%; 0/19)	0(0%; 0/14)	0(0%; 0/12)	
四校合计 (94 人)	获国内博士	60(64%; 60/94)	34(60%; 34/57)	17(46%; 17/37)	
	获国外博士	43(46%; 43/94)	28(49%; 28/57)	21(57%; 21/37)	
	获国内国外双博士	9(10%; 9/94)	5(9%; 5/57)	1(3%; 1/37)	

注:获港澳台地区博士学位统计为获国内博士学位。
数据来源:同表 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中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为 19 人。其中,北大国关青年教师有 2 人,复旦 8 人,人大 5 人,清华 4 人。19 位有博士后经历的教师中,17 人为加入现职前从事博士后研究,占 89%,这显示博士后研究经历对于相关青年教师获得现职具有重要的帮助。19 位有博士后经历的教师中,国内博士后研究经历以北大、复旦、人大、清华四校为主,国外博士后研究经历涉及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全球领袖”博士后项目(Global Leaders Fellowship)、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地区研究项目、日内瓦高级国际与发展研究院项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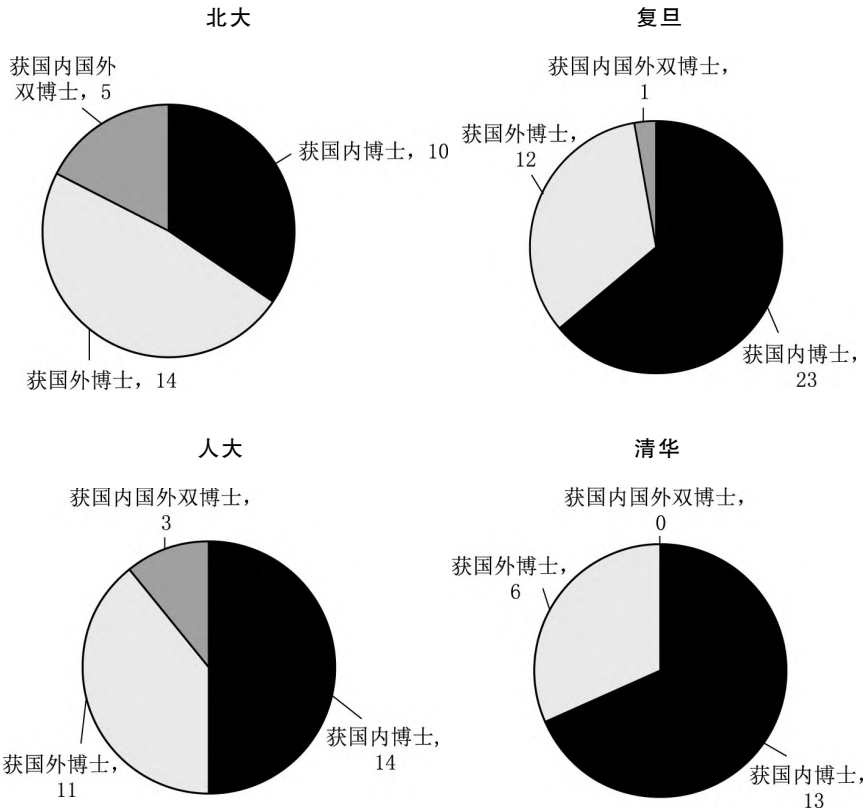


图 6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信息

注:获港澳台地区博士学位统计为获国内博士学位。
数据来源:同表 1。部分缺省数据为笔者访谈获得。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①比2010年有了显著增长,但四校的具体表现不一样。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5项。其中,复旦国关青年教师立项表现最佳,共立项25项(获立项者17人),人均0.74项(25项/34人);复旦有2位青年教师各获得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有4位青年教师各获得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人大国关青年教师的立项表现不俗,共立项10项(获立项者8人),人均0.45项(10项/22人)。人大有2位青年教师各获得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北大国关青年教师的立项数为5项(获立项者5人),人均0.26项(5项/19人);清华国关青年教师的立项数为5项(获立项者5人),人均0.26项(5项/19人)。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②是2010年时的2倍多,但四校的具体表现不一样。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学术论文165篇。其中,复旦、人大、清华的国关青年教师的表现较佳,复旦发表60篇(发表者20人),人均发表1.76篇(60篇/34人);人大发表53篇,人均发表2.41篇(53篇/22人);清华发表40篇,人均2.11篇(40篇/19人)。2020年时在职的北大国关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学术论文12篇,人均0.63篇(12篇/19人)。从个人发文数超过5篇的数据来看,人大有4位国关青年教师(发表13篇1位、发表11篇1位、发表8篇1位、发表6篇1位),清华有4位国关青年教师(各发表10篇2位、发表8篇1位,发表5篇1位),复旦有3位国关青年教师(发表8篇1位,发表7篇1位,发表5篇1位),北大有1位国关青年教师(发表5篇1位)。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6篇。^③其中,复旦、清华的国关青年教师表现较佳,复旦发表33篇(发表者16人),人均发表0.97篇(33篇/34人);清华发表21篇(发表者9人),人

① 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后期资助项目。

② 本文仅统计相关青年教师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短文、研讨会发言摘要、商榷类短文、会议综述、学者访谈类文章不纳入本文统计范围。

③ SSCI期刊的目录,来自:Clarivate,“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https://mjl.clarivate.com/collection-list-downloads>,访问时间:2022-03-23。本文仅统计相关青年教师以独著或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SSCI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均发表 1.11 篇(21 篇/19 人)。北大发表 13 篇,人均发表 0.68 篇(13 篇/19 人);人大发表 9 篇,人均发表 0.41 篇(9 篇/22 人)。

五、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未来发展思考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相对于之前的国关青年教师,学历更高(100%获得博士学位)、受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更高(获国外博士学位占 46%)、代表性科研成果数更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经济与政治》论文、SSCI 期刊论文)、更加注重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根据中国政府的“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到 2030 年,……,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①在“双一流”建设的要求下,四校的政治学一级学科建设正在瞄准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四校的国际问题研究将努力做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未来发展需要妥善处理以下六对关系。

(一) 处理好国际培养和国内培养的关系,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世界一流国关青年师资队伍

四校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且都注重推动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化。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率高达 46%,且随着青年教师年龄段的年轻化,这一比率不断提升。如果再加上国外长期访学经历或者国外博士后研究经历,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国际化程度会更高。比如,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青年教师中,19 名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其中,7 位有国外博士后研究经历。另外,以“太古/国泰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Swire Scholarship Academic Visitor)^②为例,该项目资助了北大复旦清华

^①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 号,2015 年 10 月 24 日。

^② “太古/国泰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英国太古集团(John Swire & Sons Ltd.)资助,中国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组织实施。该项目刚开始时的资助对象为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后来扩展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教师。该项目每年资助 2 名上述高校的青年教師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

三校的不少学者赴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其中复旦大学 75 后国关青年教师有 6 位获得该项目资助。

把国内培养和国际培养结合起来,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借鉴。清华“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设立于 2011 年,招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研究具有强烈的科研兴趣、并立志以其中的一国或多国研究作为学术事业的博士研究生。该项目的培养方式为:学生第一年在清华大学进行课程学习;然后到发达国家和对象国进行学习和研究,其中发展中国家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年,发达国家学习时间不多于一年;最后至少半年回到清华完成博士论文并答辩。^①本文选取的 19 名清华国关青年教师中有 8 名从该校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正在成长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较为深入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在中国政府倡导坚持“四个自信”的背景下,四校将更加重视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世界一流国关青年师资队伍。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办学理念之一是“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注重学生的“国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综合培养。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四校在继续重视国际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扎根中国办大学”的重视力度。“扎根中国办大学”对一流教师的要求不再唯海归背景,而是强调教师需兼具中国情怀国际视野。“扎根中国办大学”对学科建设的要求不再单方面模仿发达国家著名大学的学科建设,而是强调学科建设既要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又要形成中国特色。比如,自 2019 年起,复旦和人大两校的国关学院开展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会议^②,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知识体系。

(二) 处理好学科建设和支撑平台的关系,构建高水平研究型国关青年教师队伍

四校的国关院系是开展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主阵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

^①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2020 年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招生简章》, https://yz.tsinghua.edu.cn/__local/5/27/C0/21D0D2D1F07A8C144078061622D_6421D0DC_EFFDF.pdf?e=.pdf。

^② 2019 年 6 月,首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会议举办;2020 年 7 月,第二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会议举办;2021 年 7 月,第三届“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会议举办。

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开展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教学和育人工作。国际关系类的本科、硕士、博士专业招生和学位授予一般由上述四校的国关院系负责。北大复旦人大的国关学院还设立相关系,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国家安全学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设立了政治学系、国际政治系、外交学系、公共行政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国际政治学系、外交学系、政治学系。

同时,四校依托政治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搭建了各具特色的支撑平台(研究基地)。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除此之外,北大还于 2013 年 10 月成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设的、直接冠名“北京大学”的实体机构,该研究院的重点是对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相关各国的国际战略进行分析。^①复旦于 2000 年 11 月成立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整合该校原有的美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旨在办成一个综合性、开放型、以科研项目为纽带的多学科研究机构。^②复旦于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是以“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为中心的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国际发展研究所等内设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下设多个跨学科非实体研究机构,包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③、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④等。

①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院简介》,http://www.iiss.pku.edu.cn/about/brief/。

② 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我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及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载《复旦动态》2000 年第 64 期,2000 年 11 月 21 日。

③ 1997 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2010 年成立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15 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合并,成立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参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介绍》,2019 年 8 月 30 日更新,http://www.tuier.tsinghua.edu.cn/byjj/bygk.htm。

④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是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旨在打造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国际化和专业化高端智库。参见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心简介》,http://ciss.tsinghua.edu.cn/column/zxjj。

四校以学科建设为依托、以研究平台为支撑,构建了“学院/系—研究院/所”矩阵结构。这一矩阵结构让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承担科研与教学双重任务,既助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也助力构建高水平研究型国关青年教师队伍。“学院/系—研究院/所”矩阵结构促进了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的大幅增长。“学院—研究院”矩阵结构在复旦体现得非常明显,2020年时在职的复旦国关青年教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25项)中,14项来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7项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3项来自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这表明“学院—研究院”矩阵结构在构建复旦高水平研究型国关青年教师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处理好学科边界和学科融合的关系,推动国关青年教师的学科融合创新研究

自20世纪初政治学在中国创立起,中国的政治学就在确立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开始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国家间和平与战争等紧迫问题,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②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更加明显。从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从事的代表性科研项目和发表的代表性著作文章来看,涉及国际关系与经济学、国际法、民族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区域国别学将成为一级学科,凸显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③区域国别学主要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全面深入研

^① 陈岳、孙龙:《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进》,《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第57—63页。

^② 阿米塔·阿查亚、巴里·布赞:《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张发林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25页。

^③ 中国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2022年9月13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究,是多学科、跨学科、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领域。^①区域国别研究是以国别为基础,扩大到区域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全方位的研究。^②四校中的北大和清华设立了专门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平台。比如,2018年4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③2017年9月成立的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是一个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开展涵盖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地区、欧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西亚北非地区六个区域的基础性地区研究。^④

在推动国关青年教师的学科融合创新研究方面,清华的做法颇具特色。清华团队将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实践与当前的国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并将新型国际规范的设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清华路径”(Tsinghua Approach)。^⑤清华国关青年教师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国际问题,在科研上以定量分析国际关系为主。比如,2020年时在任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9位青年教师中,至少有3位教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为政治学定量方法,涉及贝叶斯方法、博弈论实证综合法、计算社会科学、社会网络分析、预测模型、大数据分析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在2017年3月建立了“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致力于将国际关系理论、多样化海量数据、社会统计方法和快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积极进行跨学科合作,进行创新性研究。^⑥截至2021年6月,清华大

① 张译心:《区域国别学迎来发展新机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25日,第2版。

② 钱乘旦:《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该怎么做?》,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3月20日, 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203/t20220320_5399647.shtml。

③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学院简介》, <https://ias.pku.edu.cn/xygk/xyjj/index.htm>。

④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研究院概况》, <http://iias.tsinghua.edu.cn/about/general-information/>。

⑤ Feng Zhang, “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1(2012), pp.73—102;徐进、孙学峰:《“清华路径”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第18—32页。

⑥ 苗争鸣:《“计算国际关系学”的提出与学科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0月16日, http://ex.cssn.cn/gjgxx/gj_bwsf/201910/t20191016_5015074.shtml;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首期“纸外谈兵”圆桌访谈》,2021年4月13日, <https://www.dir.tsinghua.edu.cn/info/1111/1827.htm>。

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已举办十九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向学员讲授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①

（四）处理好代际差异和代际传承的关系，强调既体现时代特色又继承优良传统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学科化则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巍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分为五代^②：第一代学者集中于1952年之前接受大学教育，他们中的代表性学者有王绳祖（1905年出生）、李慎之（1923年出生）、资中筠（1930年出生）等先生。第一代学者的贡献体现为推动中国的外交转型，着手文革后的学术机构重建，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起步。第二代学者主要是文革前（即1952年和1966年之间）接受大学教育，集中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他们中的代表性学者有冯特君（1932年出生）、梁守德（1936年出生）、方连庆（1936年出生）、刘金质（1939年）、倪世雄（1940年出生）等。第二代学者的贡献体现为推动了国际关系独立学科的形成，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博士，展开了大规模的学科建设等。第三代学者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大学教育，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他们中的代表性学者有王缉思（1948年出生）、阎学通（1952年出生）等。第三代学者的贡献体现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有意识地引进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思维，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分野和学术流派等。第四代学者大多出生于1961—1976年，大多获得博士学位，是当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力，这些学者目前是中国主要学术机构的领导人。第五代学者集中出生于1977—1989年，目前正在逐渐成为国内国关学术共同体的主力成员。

李巍所描述的第四代/第五代国关学者分别和本文中的2010年/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大致对应。1965年以后出生且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重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研究，开展了

^①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第十九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顺利举行》，2021年7月17日发布，<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091/5601.htm>。

^②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公众号：《李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2019年5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uwT4p4X5i28zq_vcwzEKlg。

国际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开始把国际关系的科学规范方法用于国际关系分析中。1975 年以后出生且 2020 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平视的一代”,本文的数据显示,他们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日益主动地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更加注重科学规范方法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运用,开展了国际关系与自然科学的文理融合研究。

新一代国关青年教师要注重代际传承,既体现这一代青年教师的时代特色又继承前几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新一代国关青年教师在继续学习国际先进知识的同时,更要重视对中国自身国关学科发展的了解和中国国关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传承。以下三方面的做法可供参考:一是新一代国关青年教师可以和前辈学者合作编撰中国的国关学科发展史、国关学术史、院系史等,把前辈学者的优秀成果和优良作风记载下来,以便更好地传承。二是建立国关青年教师“职业发展导师(Mentor)制”,邀请本校优秀资深国关教师或外校专家担任导师(Mentor),为国关青年教师提供精准指导,从而有助于国关青年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三是邀请国关前辈学者为青年教师分享治学人生感悟。

(五)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

中国的国关研究存在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离的现象^①,有学术和政策“两张皮”之说^②。四校国关院系和研究院既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镇,又是为中国外交外事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机构。尽管我们不需要四校的国关青年教师都要同时做好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但是对有志于用才智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青年教师来说,需要努力思考两者的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并非对立或者不同的两个领域,高水平的政策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更是理论研究发展所不可缺少

^① 王缉思:《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2 页。

^② 达巍:《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58 页。

的经验来源和动力。^①国关青年教师兼顾两者的一个可行路径是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这需要青年教师具备扎实而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素养,对相关领域进行长期、细致和及时的政策跟踪,对政策对象国保持持续的“田野研究”,与政府部门开展密切的互动。

四校“学院/系—研究院/所”矩阵结构为青年教师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提供了平台。其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是“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②外交部会召开“重点合作智库工作总结会”和“重点合作智库专家学者务虚会”,邀请“外交部政策研究重点合作单位”参与会议,这是外交部与智库交流的重要机制。北大复旦清华等机构的一些国关青年教师也有机会通过上述机制和外交部高级官员开展交流,这有助于青年教师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

四校与外交部开展青年教师借调到驻外使馆工作也为青年教师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其中,复旦积极与外交部合作把国关青年教师推荐到驻外使馆等外交一线工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1975年以后出生且2020年时在职的16名青年教师中,有4名有驻外使馆借调经历,其中,2名借调中国驻印度大使馆、1名借调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名借调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这些被借调驻外使馆工作的青年教师积累了外交一线工作经验,对他们个人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颇有帮助,对所在机构开展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也颇有助益。

(六) 处理好校际竞争和校际合作的关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差异化跨校合作

“双一流”为中国的大学和学科搭建了一个竞争场,这尤其体现在评估时。2017年9月《第一轮“双一流”名单通知》和2022年2月《第二轮“双一流”名单通知》^③指出,进入“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的政治学建设高校包

① 朱锋:《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路径与方法》,《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29页。

② 《第二轮“双一流”名单通知》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并自行公布。

③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高校评估结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7年12月,<http://www.cdgc.edu.cn/xwyyjsjyxx/xkpgjg/>。

括(按学校代码排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政治学都是 A-,这两所高校将是第三轮政治学一流学科的有力竞争者。^①考虑到政治学一流学科数量有限,“强进弱出”和“强上弱下”导致校际之间的激烈学科竞争。目前中国“双一流”建设学科和所依托单位之间,存在过度强调竞争,而缺乏考虑合作推进中国在该学科整体迈向世界一流的考量。^②

“双一流”建设中的校际竞争和学科竞争不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并非非此即彼或你死我活。中国高校的国关学科更需要携手共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百家争鸣”。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尤其需要这样的情怀和担当,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开展国关学科的校际合作。一是,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可就共同的研究领域开展跨校协同创新研究,合作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二是国关青年教师可形成各自的原创性研究特色,形成差异化,这是未来跨校合作的一个重要路径。三是开展校际之间的青年论坛活动。比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发起、轮流主办的“复旦—北大(北大—复旦)青年国关学者论坛”^③,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从 2019 年至 2021 年举办了三届青年学者论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研讨会。^④

综上所述,“双一流”建设为四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国关青年教师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新一代的国关青年教师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期待他们做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政策贡献。与此同时,他们需要处理好六对关系,即国际培养和国内培养、学科建设

①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高校评估结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2017 年 12 月,<http://www.cdgc.edu.cn/xwyyjsjyxx/xkpgjg/>。

② 赵星、蔡前黎、乔利利:《合作与竞争: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学科的分布格局》,载《图书与情报》,2018 年第 4 期,第 8 页。

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第一届复旦—北大(北大—复旦)青年国关学者论坛举办》,2015 年 11 月 12 日发布,<https://iis.fudan.edu.cn/80/d3/c6840a98515/page.htm>;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届“北大—复旦(复旦—北大)青年国关学者论坛”成功举办》,2016 年 11 月 4 日发布,<https://www.sis.pku.edu.cn/news64/1301838.htm>。

④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届青年学者论坛“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研讨会顺利举办》,2020 年 7 月 26 日发布,<https://sirpa.fudan.edu.cn/info/1079/3914.htm>。

和研究平台、学科边界和学科融合、代际差异和代际传承、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校际竞争和校际合作的关系。在未来的事业发展中,他们既需要努力学习前辈国关学者的优良作风,又要努力超越前辈学者,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应有的智力贡献。他们的未来成长可期。